



创业者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洪园 通讯员 魏岳奇

退学的『创二代』死磕『搬运机器人』

前进、后退、转弯、避让……在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深圳园展示中心内，一台长方体形状的白色搬运机器人驮着货架自由穿梭。

“这已经是我们的第七代产品了，别看它个子小，载重可达800多公斤。”河北融和通智能科技负责人张斌介绍，这款机器人最初是针对银行业的需求研发的，目前已广泛应用于银行、金库、工厂车间、物流等领域。

“我们率先在全国银行业使用搬运机器人。”这名36岁的年轻人自豪地说。谈起创业的初衷，张斌坦言，作为一名“创二代”，自己做搬运机器人跟父亲的公司业务有很大关系。

张斌的父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老家河北定兴县创业，主要做银行和金库用的钱箱，是国内多家银行的供应商。张斌十几岁的时候就跟随着父母谈业务，对经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对计算机、机械类的东西感兴趣。

“我从小手能力比较强，喜欢拆卸、组装家里的电器。”张斌说，2002年，他对航模产生了兴趣，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获得了当年全国青少年航空航模锦标赛河北赛区的第一名，2003年又获得了该项赛事全国比赛的第二名。2009年，张斌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计算机专业，但开学没多久，他就决定退学去创业了，“我不想错过这个时机”。

大二那年，张斌决定退学。他的第一个创业项目，源自天津一家银行行长的诉苦：银行金库管理人员每天需要面对大量入库的钱箱，一直在沿用眼看、手抄、笔录的传统方式，效率低、风险大，而且钱箱的搬运需要大量的人力，尤其是贵金属的箱子非常沉，有时还会有工作人员在搬运的过程中受伤。

利用国外成熟的技术，张斌带领团队做了一套银行金库射频识别(RFID)信息管理系统。他介绍，利用这套系统能够实现金库业务电子化交接及自动盘库。同时，这套系统提供完备的日志管理功能，能查询历史数据。

“这套系统大幅提升了银行金库的工作效率，同时控制并降低各环节风险。”张斌说，这套系统推出后，在银行和金库很受青睐，全国有19个省份的银行和金库购买了这套系统。这让他积累了自己创业以来的“第一桶金”。

对于金库钱箱搬运的难题，张斌的想法是研发一款搬运机器人。从2012年开始，张斌带领团队研发智能搬运机器人。由于一些关键技术瓶颈，研发一度陷入困境。2013年，美国亚马逊的Kiva机器人开源之后，张斌马上带着技术人员开始学习。“都是英文的资料，我们一边翻译一边摸索。”他说，终于在2015年他们造出了第一代搬运机器人。

2016年，天津市河西区的一家银行金库购买了他们的第一批产品——3台智能搬运机器人。很快，他们的产品卖到了全国各地的银行金库。在广东省的一家银行金库，每天早上要搬运数亿元现金，之前因为押运车早上7点前就要出发，18名搬运工人凌晨4点半就要开始工作，大约两个小时才能搬完。这家银行金库采购了14台搬运机器人后，45分钟就能完成工作。

除了银行系统，几家需要搬运的大型工厂也采购了他们的产品。一家大型电器企业在应用的过程中发现，因为搬运机器人的重量比较大，尤其是搬运机器人爬坡的时候，货架容易倾覆，他们希望张斌团队能解决这个问题。

张斌开始想办法。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去参加一个朋友的中式婚礼，轿夫抬轿子的情景一下子给了他灵感。“花轿比较稳定，是因为有4个人抬。4个点能不能应用到我们的机器人上呢？”回到公司后，他立马跟技术人员商量，在搬运机器人顶升机构的四角，再增加4个支点。

顶升机构经过改造的搬运机器人造出来了。随后，张斌申请了专利。2018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大会在北京召开，张斌的公司应邀参加。凭借此项专利，他们获得了大会组委会颁发的2018人工智能行业突出贡献奖。

站在保定市莲池区深圳园展示中心的三楼，张斌指着不远处的一片土地告诉记者，因为产品供不应求，他们投资建设了新工厂。新工厂占地30亩，总投资1.35亿元，将年产搬运机器人1200台，年产值将达到两亿元。

张斌说，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他非常有紧迫感。“一旦松懈，就错失良机，跟不上这个时代。下一步公司将进行人形机器人的研发，并打算进军海外市场。”

以前是“一根网线走天下”，现在是一群年轻人共居共享共创

乡村数字游民社区如何留住“全球合伙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孟佩佩

“60多个合伙人和新经济项目落地，1200多名青年常态化驻地办公，‘新乡人’数量甚至超过了‘原乡人’。”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近日用这组数据向记者展示了余村的变化。

两年前，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汪玉成走上全国两会“代表通道”，余村招募“全球合伙人”的故事由此传遍大江南北。自余村“青来集”园区、数字游民公社陆续开门迎客以来，“新乡人”带来了国漫咖啡、机器人研学基地、观星社等新场景、新业态，整个村子更时尚、更年轻了。

在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高山村，大蒜也没想到自己成了“咖啡搭子”。一年能卖出7万杯的大蒜咖啡，创意就来自榜样青年社区负责人戴超与入驻社区的年轻咖啡师。一群住在社区的数字游民、创业青年还为高山村量身打造了首届“春季大蒜季”，各式各样的踏青活动让周末的乡村热闹非凡。

“一根网线走天下”，把工位搬到风景里的数字游民，曾经颇受关注。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这两年，天津、云南、浙江、四川、海南、安徽、广东、上海等地均已布局数字游民社区建设，当地政府以人才政策持续加码，吸引年轻人入驻。如今，许多年轻人成为“新乡人”，他们让乡村拥有了新业态、新场景、新消费。

一群年轻人共居共享共创，乡村新业态不断“上新”

“数字游民公社和‘青来集’园区落地，我们有了落脚的地方，还可以和一群相似的人一起工作生活。”热爱骑行的80后女生卓莉之前在上海工作，经常骑行路过余村，却一次都没有走进去过。2023年8月，她带着一份骑行俱乐部的创业计划来到余村，一待就是500多天。

这是余村第一家骑行俱乐部，在村委会和公社的大力支持下，公社附近的一座破旧老宅被改造成“蓝房子乡野之家”。随后一年半的时间里，卓莉和团队成员一起，以余村为枢纽，开发出30条骑行旅游线路，骑行们可以在村里用餐、住宿，离开的时候还能带走一份特产。“参加活动的骑行们非常喜欢余村，以前可能短暂停留就离开了，但现在，大家可以选择在余村过周末，也可以累了坐下来喝杯茶聊聊天，体验感不一样了。”在她看来，乡村要向年轻人展示自己的吸引力，“如果能够年轻人暂时停下脚步或经常前来，随着人越来越多，总会碰撞出共创的机会”。

像卓莉一样的“新乡人”也改变了余村的“原乡人”。汪玉成告诉记者，余村本地姑娘俞佳慧在看到乡村变化后也选择了返乡创业，参加了“余村全球合伙人”路演。“现在，俞佳慧不仅拥有了自己的绿色农场，还建起一栋茶舍民宿，让游客在品味安吉白茶的同时，体验乡村的闲



▲余村的“全球合伙人”们。3月3日，在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高山村村农创客创业油菜花田里，农户向参加研学的小朋友讲述蜜蜂的秘密。受访者供图



适。”最近，2025年余村全球合伙人计划也已启动招募。

00后女生周溪选择入驻高山村的榜样青年社区，是因为她所运营的农耕研学项目在这里落地了。

“我们开展插秧、收割水稻、采摘等农耕体验项目，村委会和农户都给予了充分支持和配合。”最近，油菜花盛开，她们组织亲子家庭走进油菜花地、认识蜜蜂，村里养蜂多年的农户成了老师。小朋友们在这里学到新知识，家长们还可以直接向农户购买土特产。在社区居住了半年多，她觉得这里的年轻人已经是一家人了，“正在开展的首届‘春季大蒜季’就是大家一起讨论、创造出来的活动，希望通过共同努力，把它办得精彩有趣”。

去年年初，95后数字游民梅星宇了解到浙江省杭州市梅林村的Qspace数字游民社区后，就从泰国清迈回国了。“社区内测期间主打AI主题，这恰恰是当时我想了解的领域。”她说，“我们会不定期举行与职业和旅居相关的分享会，比如，邀请互联网公司的从业者向我们介绍AI的发展、分享AI图像研发、设计等。大家也经常进行‘思想碰撞’，没准儿就会互相启发，带来更多事业上的发展。”借助杭州良好的营商环境，梅星宇尝试了社区型酒馆的运营，也在不断探索不同领域的合作。

资阳国际数字游民社区位于四川省资阳市临空经济区仁里村，负责人潘潘希望能为“i人(指性格内向的人)”打造一个

舒适空间，让“大家来到社区可以更好地与自己对话”。让潘潘觉得高兴的是，社区主打“共创”，许多入驻的年轻人自发办起了活动，“有人主动分享创业经验，有人为村里小朋友教授英语，也有自媒体博主在这里做起了数字游民访谈……这是社区美好的地方，是时间久了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

数字游民社区作为“纽带”，让一群年轻人共居、共享、共创，为乡村带来新的经济活力、人才流入甚至技术支持，新业态不断“上新”。

高山村成了新晋“网红打卡地”，招牌“大蒜咖啡”让更多年轻人加盟，共同开启后备箱咖啡创业之路。戴超说，今年年初，他们和北京大学一支学生团队进行合作，为大蒜打造了独有的文创产品。资阳国际数字游民社区所在的仁里村，有了山顶咖啡厅、特色餐厅、宠物新消费俱乐部、露营地和美术馆酒店，未来也将有更多新业态推出。

数字游民变“新乡人”，社区建设、人才政策都要跟上

创办榜样青年社区之前，戴超经营过民宿，开设过研学项目，尝试过不少乡村业态的产品运营。与高山村一拍即合，恰恰是因为村里想发展新业态，而他想探索“能否在乡村发展中实行合伙人制度”。

“我们培养愿意前往乡村并且热爱乡村的年轻人，将一技之长带到乡村，转化

成商品。如果商品可以盈利并形成商业闭环，我们还可以投资。”戴超发现，成都的许多年轻人都考虑过去农村发展，“体验诗和远方的生活”。于是，他们与村集体合资成立了公司，将村委会旧址改造成青年社区，既有咖啡厅、餐厅，也有路演厅、会议室和共享办公空间等，还有可供长期居住的公寓。随后，他们对整个高山村的闲置院落进行了重新梳理，使之成为年轻人的创业孵化空间。

“我们发现一些前来入驻的创业者只有技术，没有产品，我们要帮助创业者梳理产品、创建品牌，进行陪跑式孵化。”如今，许多院落有了自己的主理人。戴超笑称，在社区共建过程中，村干部们也在积极学习市场化思维，动员亲朋好友回乡发展。“社区举办市集等活动时，会专门留出摊位邀请村民参与，随着周末客流量的增加，原来不愿意进行房屋改造的村民，也在积极参与改造了。”

“利用乡村闲置空间构建可持续的乡村生态社区，营造出全新的青年返乡所需要的生态与‘土壤’，才能持续为乡村带来年轻人。”去年12月，丽水市委人才办等九部门推出《丽水市支持数字游民发展八条措施》，全域招引数字游民。借此机会，徐仲选择在丽水市遂昌县湖山乡湖山街办起了Cohere数字游民社区，目前正在进行第二轮内测。他说：“通过社区的方式为乡村聚集一群年轻人，让他们为地方创造更大的价值，同时也获得更多回报，这是我们想要在丽水实践的。”

汪玉成也认为，青年聚集的社区能够

这群青年“玩转”大鹅产业链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杨雷 记者 金卓

提起大鹅，很多人会想到：铁锅炖大鹅。一只鹅从鹅蛋到鹅肉，要经历哪些环节？大鹅能带动哪些产业发展？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近日来到养鹅大市——黑龙江省嫩江市。2024年，该市出栏271.2万只鹅。几天来，记者陆续走访嫩北农场、海江镇、伊拉哈镇、大西江农场、鹤山农场等地，发现一群年轻人正在“玩转”大鹅产业链。

为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也带动大量就业

1987年出生的李福生“玩”出了新花样——用鹅血和鹅油做化妆品。“鹅血冻干粉可以做面霜，鹅油可以做护手霜。”李福生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已总和广州的一家化妆品公司合作了，“我出配方设计，他们加工”。两款产品的市场目前还没有完全打开，“但我想试试水”。

做化妆品是李福生的“副业”，他的“主业”是做以卤鹅为代表的深加工产品。2024年，他公司的卤鹅线上销售额近3000万元。记者采访李福生时，网购平台的提示音不断，现场多名客服正在回答消费者提问。

对于几千万元的销售，多年前还是上班族的李福生想都不敢想。2012年，他从东北林业大学工程管理专业毕业后，进入北京一家央企工作。26岁时，他成为总经理助理。考虑到父亲身体不好，2016年，李福生回到嫩江与发小一起创业。听说儿子要回来，父亲一气之下曾经拒绝治疗。“我非常上火，只能把企业做好，让父母看到，其实创业也还可以。”

“大家都说鹅产业不错，我调研了一下，当时整个嫩江甚至全省，养鹅的不是特别多，做深加工的企业也很少。”2018年，李福生开始养鹅。从2018年的1万只

到2024年的8万只，养殖规模扩大的同时，他的公司也逐渐过渡到了利润更大的深加工环节。

1988年出生的退伍军人梁文军也在养鹅中挣到了钱。去年，他家一共出栏7万只鹅，净利润200万元左右。“政策很支持，养大鹅有补贴。”梁文军口中的补贴分省级和市级两个层面。按照2024年的政策，梁文军拿到了7万元补贴。

据悉，嫩江市政府还为规模养殖场提供短期贷款贴息支持和保险补贴。2024年，嫩江市大鹅保险投保294.6万只，保额1.4亿元，仅保险补贴一项当地政府支出277.5万元。

鹅产业除了能为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其上下游产业链还可带动大量就业。嫩江市畜牧兽医总站提供的数据显示，按照养殖500万只鹅计算，养殖端就业人数达1200人，屠宰加工企业就业人数达370人，鹅深加工产业就业人数达270人，同时，还可催生技术服务队、鹅经纪人等就业人群。

得吃苦，还得敢创新

鹅产业虽然利润可观，却是一个十分辛苦的行业。

1984年出生的宋凌宇此前在北京一家科技公司上班，后来回乡养鹅。刚开始他养了2000只，“摸索着干”。因为不懂防疫，小鹅一死死一片。很多时候，他凌晨两三点就得开车去齐齐哈尔买抗病毒血清，回来后紧急给鹅打，“一整就是一宿”。

2022年是宋凌宇最崩溃的一年。那一年，他养了7万只鹅，死了近3万只。但当年年底鹅收购价格创历史新高——13.7元一斤。整体算下来，宋凌宇还有得

赚。这也是他没有放弃这个行当的原因，“养鹅得沉得住气”。今年，他计划养10万只鹅。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海江镇见到宋凌宇时，他正安排工人烘干饲料，为即将到来的“10万大军”准备“粮草”。

梁文军在鹤山农场养了5000只种鹅。这里将日产2000枚种蛋。为了提高产蛋率和蛋壳硬度，梁文军化身“营养师”，在饲料中加入鱼肝油、维生素，为鹅增加各类营养。

最近，已有鹅陆续产蛋。梁文军说，种蛋的售价和受精率有关，他领着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来到一个房间，火炕上放着一个小型全自动智能孵化器，上面显示箱体温度、湿度等信息。孵化器里面有3层，还做了记号。梁文军说，他想要比较一下受精率，然后调整鹅棚的温度、湿度、光照。

记者手记

□ 杨雷

黑龙江省嫩江市曾被贴上“老工业基地”“人口外流”的标签，如今正因一群青年的回归，悄然生长出新的可能。

在宋凌宇的养殖场，深夜两三点灯光格外刺眼。他曾蹲在鹅棚里，仔细检查注射抗病毒血清后的鹅苗，“养鹅是‘伺候’活儿”。这种近乎执拗的坚持，几乎出现在每一位受访者身上——退伍军人梁文军把当兵时的严谨作风带到养殖场，对温度、湿度、光照等各种数据信手拈来；

1986年出生的王洪刚是位于伊拉哈镇的嫩江市寒鹅孵化基地的负责人。走进基地，一个个小房间敞开门，内部是摆放鹅蛋的架子。每个小房间都有自己独立的智能控制系统面板，能实时显示温度、湿度等数据。

在做鹅蛋孵化之前，王洪刚养了5年鹅，一共养了20多万只。那时本地没有大型孵化场，买小鹅基本得去哈尔滨等地。但长途运输对刚破壳的小鹅是一大难关，“能不能自己建一个孵化基地？”去年，王洪刚投资了200多万元，从安徽请了4名专家，在嫩江建了一个孵化基地。

王洪刚给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算了一笔账：孵化基地一共有50个孵化器，一批次可孵化50万枚蛋，整个孵化季（共3批次）可孵化150万枚蛋，一枚蛋预计能挣8毛钱，150万枚蛋就能挣120万元。

李福生为研发鹅油护肤品、鹅血面霜，组建了一支拥有多名博士的研发团队……这些细节颠覆了我对农业“靠天吃饭”的固有印象：现代农业的竞争，早已是技术、管理、创新力的综合较量。

更触动我的是这群“新农人”对乡土价值的重拾。王洪刚的孵化基地建在草原和公路旁。在农业时，他觉得农村没出路。现在他发现，这里的水塘、草原甚至低湿气候，全是养鹅的天然优势。从离开到回归，这种认知转变，恰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内生动力。

在屠宰厂，我目睹了传统与科技的碰

他已经和6家种养殖户签了协议，预付了10万元定金，“优质种蛋得抢”。

从事大鹅屠宰加工的李志涛1988年出生，在嫩北农场拥有一家大型屠宰加工企业。

每年6-11月是他最忙的时候，屠宰线上最多有150多人同时工作。他的公司不光承接屠宰任务，还销售白条鹅。利润最好的一年，有3000多万元。

在大鹅屠宰加工行业多年，李志涛坦言，如何降低人工成本是他经常考虑的问题。在他的公司，人工成本占企业运营成本的20%左右。因为目前还没有高度自动化机器能完全替代人工，“有些长在鹅肉里的毛，还得人来拔”。

前些年，李志涛的公司上线了一套食品工业用松香甘油酯脱毛生产线。今年，他计划再上一套新生产线。

流水线上，脱毛机自动化水平越来越高，但仍离不开人工。“机器替代不了人力。”负责人李志涛的话，道出了农业现代化的真实图景：不是彻底颠覆，而是渐进改良。这种“半自动化”的务实，或许正是当下中国乡土产业升级的典型路径。

离开嫩江时，后视镜中的鹅群、养殖场、屠宰加工场逐渐模糊。但那些年轻的面孔、深夜的灯光甚至鹅粪与饲料的混合气息，却愈发清晰。这些青年的故事让我看到，农业的未来，不在逃离与怀旧中，而在于如何让土地生长出与时代共振的新故事。